

13103

三明文史資料

第九輯

91

25

36500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明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三明

目 录

忆大田县的一次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郑成辽 (1)
南下入闽琐忆·····	刘桂生 (3)
三元解放二三事·····	张大林 (9)
解放前夕动荡的永安·····	邓家焕 (12)
追剿清流江雄生股匪·····	徐逢宝 (15)
前进中的三明·····	陈孝华 (18)
福建水泥厂厂史·····	福建水泥厂 (22)
富机搬迁与三钢复产·····	闻 姝 (39)
三明供销合作事业发展史·····	三明市供销社 (43)
三明医药业史略·····	曾昭煊 (56)
发展中的三明市园林建设·····	何远志 (62)
沙县地方工业发展概况·····	杨发章 (66)
江苏学院在三元·····	牧 莎 (69)
解放前三明的职业技术教育·····	赖宝珊 (73)
忆第二临时中学·····	李映秋 (78)
三明工业大专班始末·····	林善璋 (81)
记致力于山区医疗事业的叶元赞医师·····	林秀芳 (84)
忆尤溪一中陈祖珩校长·····	林秉松 (89)
忆刘贵桃先生·····	刘振邦 (93)
画网巾先生事略·····	江 雨 (95)

三明物产溯源·····	郭富小 (98)
前人护林绿化之举·····	林伦榕 (102)
宁化客家人的饮食、婚嫁及游艺习俗·····	宋经文 (105)
建宁瀾溪古窑址·····	刘光羽 余先富 (110)
关于征集“全闽师范——福建师范——永安师范—— 三明师范”校史资料的启事·····	(111)

忆大田县的一次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郑成辽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闽中戴云山下的大田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大田就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党组织曾利用学生运动会组织者抽签舞弊事件，发动了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那是1939年11月，国民党大田县政府举办全县中小学生会，我被奇韬中心小学选拔为田径运动员，第一次进城参加运动会，心情特别高兴。运动会开幕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运动场四周彩旗飘扬。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准备整队入场时，带队的杨老师突然通知我们说，今天不参加开幕式，改到一中后操场听演讲。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面面相觑，我们在低头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上午八时多，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一中后操场，这里已是人山人海，一千多名运动员和教职员工列队聚集在大操场上。九时许，一位头戴礼帽，身穿普通中山装的中年教师站在操场中央演讲。他身材不高，椭圆形的脸庞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义正辞严地说道，同学们，老师们！运动会的组织者在抽签安排比赛活动中营私舞弊。对此，我们要求重新抽签，但组织者对我们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我们要采取集体行动。除集美学校外，大家都同意不参加开幕式，以示抗议。运动会的组织者如果不重新公正安排比赛活动，我们就决不参加比赛！

他接着又义愤地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开运动会，是很幸运的。大家想到了没有？日本帝国主义梦想把我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祖国半壁河山已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千万万百姓惨遭杀害，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许多多象你们这样的儿童学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这时，我看见他昂首挺立，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随后，他又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现在，抗日烽火已遍地燃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让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

演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激昂的声音在操场上空回荡，经不久息。

当时，我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虽然对中年教师的演讲似懂非懂，但他那庄严威武的神态，激动人心的演讲震撼了我的心。散会后，我听老师说，他就是武陵中心小学校长，受人尊敬的林大蕃老师。几年后才知道，原来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大田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闽中工委书记闽西北特委书记，1945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壮烈牺牲。

运动会上的这场风潮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一次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这场风潮使国民党县政府惊惶失措，他们惧怕事态扩大，不得不于第二天重新安排比赛活动，斗争取得了胜利。林大蕃校长宣传的抗日救国道理给我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推动了大田县抗日救国斗争。五十多年来，林大蕃同志在大田一中演说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难忘。

南下入闽琐忆

刘桂生

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当时我在解放区的山西省黎城县政府财粮科任科员。在抗日战争中艰苦鏖战，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太行、太岳山区，此时已成为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元旦，新华社转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新形势，配合渡江战役，在长江流域解放新区建立人民政权，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华北局决定组建南下区党委和军区，下辖6个地委，30个县委，从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选调4000名干部，到区党委和军区工作。由原太行区党委副书记冷楚担任南下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陶国清任军区司令员。

1月中旬，各级组织开始南下调干动员，我也向县委报了名。2月初，我返回家乡上遥区过春节，向父亲说明了准备南下之事。父亲刘玉堂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虽然舍不得我这个独子远征，但并没有拖后腿，积极支持我南下。初四我返回县城不久，知道南下名单中有我，并通知要在正月十四集中报到。于是我匆匆告别家人，年过半百的父亲一路叮咛，步行送我返城。我们黎城近百名干部，集中到长治地委学习，然后又到太行区党委所在地河北省武安县集训。3月22日，太岳区1000余名干部前来会合，在一起共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郭沫若的

《甲申三百年祭》，听形势报告，上军事课等。3月30日召开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宣布全体人员编成六个大队，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每人发了制服、衬衫、蚊帐、背粮袋和“铁鞋掌”，以备行军之用。我被分配在第三大队第三中队供卫股，大队长是长治专署专员侯国英，政委是地委书记贾久民，中队长由襄垣县长吴颜荣担任，教导员是潞城县委副书记吴炳武。长江支队4000余人中有2800名共产党员，在三中队里，我虽然已有3年党龄，却只有18岁，与岳忠壁、马向荣同龄，数三中队最小，都是六年制高小毕业生，算有点文化的人，所以我任会计，负责后勤供应、调拨粮草、管理帐务。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次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百万大军立即发起总攻，顺利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根据北平会议对南下干部随军渡江的部署和华东局饶漱石的请求，长江支队将去苏、沪、杭一带负责接管。4月24日凌晨，我们冒雨离开武安南行，除了大队领导以上干部骑马外，其余人打着背包步行，未出河北境界，即传来南京23日解放的捷报，次日又传来太原解放的好消息，大家纵情欢呼。4月28日，我们大队人马宿营在安阳城郊，虽然距离敌人很近，但敌人孤军被围，未敢轻举妄动。5月3日下午在中原局的安排下，我们乘火车南下，经过10多个小时的颠簸，到了黄河北岸的老田庵车站，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

5月4日我们到达开封，吃过早饭继续南行，第二天中午到达淮河北岸。由于淮河大桥被敌人炸毁，大队人马只好下车步行，从浮桥上通过。在蚌埠宿营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很受感动，并在蚌埠休整了3天。5月5日传来杭州解放的捷报，同时传达了上级决定让我们三大队接管苏州的指示，大家十分兴奋。随后我们继续乘火车南下，但因铁路被破坏，中途又

只得跋涉前进，走了五天时间，来到长江北岸的浦口。隔江望南京，大家心里都十分感慨，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被国民党统治了22年之久的南京终于回到了人民怀抱中。5月12日下午，长江支队同志分批乘轮渡过长江，山里人一下子到了波涛帆影的江面上，那感受终身难忘。登岸后，我们宿营在下关火车站军用仓库，不料，第三日早晨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近一个小时，虽然因高空投掷不准，不少炸弹落在江里，但我们也受到轻微损失。5月15日我们全部搬到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九草山。在南京10多天，支队组织大家分批参观南京的名胜古迹，如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紫金山天文台、国民党总统府及行政院，其他时间多集中学习，由各大队政委作形势报告，学习有关文件。当时一般不允许独自行动，我因负责后勤供给，持有特别通行证，可以顺便浏览市容，看到城里到处贴有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签署的布告和约法八章。

5月23日下午，上级命令我们乘火车向苏州进发，此时前线部队正在打上海，隆隆炮声不时传来，大家知道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即将解放，都异常激动。我们到达苏州时，苏州已被我军韦国清部解放10多天了，支队部驻扎在苏州阊门外原国民党青年军司令部，我们三大队驻在原国民党陆军监狱平房。由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国解放进程大大加快。沿海的福建一解放，十分需要干部。6月初，华东局决定长江支队随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于7月进军福建。我们听说福建山多、雨多、蚊虫多，不少人思想有波动，都希望留在苏南工作。各大队、中队领导一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并请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作“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经过学习和教育，统一了认识。7月1日，我们在苏州以大队为单位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大会，大家都说党叫干啥就干啥，表态先去福建工作3~5年。

在苏州休整集训了50天时间，7月13日，我们身着人民解放

军三野十兵团赠送的全套解放军服装，愉快地从苏州出发，第三天步行到了浙江嘉兴，再乘火车南下。途经杭州见到钱塘江大桥，大家都发出惊叹声。快到江山时，敌机又来空袭，由于我们只有长短枪和少数冲锋枪，没有重武器反击，敌机低空轰炸时，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机徽都看得一清二楚，幸亏及时疏散，才没受到大的损失。随后我们到达宿营地，支队部驻兴塘边，我们三大队驻塘板镇。这一带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的家乡，政治情况复杂，散兵、土匪多。贾久民政委的警卫员就在这天下午四时突然被打黑枪，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大队还派出了武装巡逻班警戒。在塘板一周时间里，我们主要听取福建情况介绍，并作好参加剿匪的准备，留下重病号和身体差的女同志，把可以不带的行李处理掉，轻装进入福建。

7月28日我们冒着酷暑行军，爬山涉水翻越浙闽边境的仙霞岭，由于天气闷热，连续行军不少人病倒，但仍坚持前进。8月1日到达闽北的浦城县，随即分乘汽车前往建瓯城，与福建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在建瓯期间，上级决定由三大队接管南平地区，贾久民任地委书记，侯国英任专员。一中队驻南平，二中队到沙县，三中队去尤溪，四中队往古田，五中队在顺昌。自7月下旬以来，三野十兵团各部相继抵达南平、建瓯、古田一线，全面组织和发动福州战役。据整编统计，当时溃退入闽的国民党残军尚有17万之众，我军十兵团等入闽部队也有15万人，粮草需要就地筹措，就地补给，支前任务十分繁重。8月中旬，福州战役开始，我与中队10多位同志抽到当地党组织组建的民工大队工作，该民工队约千余人，由左丰美任大队长，黄国璋任政委，侯林舟任参谋长，指挥运输队、担架队为部队运送粮草、弹药、伤病员。由于白天行动目标大，有敌机轰炸，只好昼伏夜行。时值雨季，山路泥泞跋涉艰难，8月17日我到达古田时福州解放。8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和福建军区同时在福州成立，由张鼎丞

担任省政府主席，叶飞任军区司令员。

民工大队的任务完成后，我返回南平地委组织部报到，随即准备前往三中队所在地的尤溪县。尤溪在闽北是个大县，当时人口约15万人，但山高林密匪患较多，主要有卢兴邦的第52师余部和县参议会议长、县党部书记洪钟元父子的卢、洪两派。8月下旬，我中队10余人与解放军一个连押送一木船人民币，从南平码头出发，走了五、六天，到达了我南下的最后一站尤溪县，结束了长达4个月跨越7个省数千里路的南征。我到尤溪县委组织部报到后，领导分配我到县政府财粮科当审计，负责县财政预算管理。我与县政府秘书栗树旺，县财粮科长程继枝共住一间房子，当时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干部供给制，每月9元钱伙食费，6角钱零用费，县长、书记也一样。尽管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许多人还患了疟疾和肠胃病，常常思念家乡，但我们工作仍非常努力，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业余时间唱歌、打球、学习，十分活跃，精神面貌很好。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在尤溪城关城隍庙举行了隆重庆祝大会，有近2000人参加，县委书记吴炳武、县长李生旺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还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

我们三中队百余人，除了三、四十人留在县委、县府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各区乡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生产减租以及征粮征款工作。这时尤溪土匪活动猖獗，曾多达三、四千人，尤其是抗美援朝开始，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时机已到，就不断袭击我区公所和地方干部。因此我们曾用一个团的兵力到尤溪剿匪，至1950年底土匪基本被肃清，1951年春匪首洪钟元、卢兴雄先后落网，被公审枪决。

1950年底，组织分配我任尤溪城关镇土改工作组组长，协助区委书记王芳芹开展土改试点工作。1951年初组织上调我到上海华东财政部粮政工作研究班学习三个月，陈国栋部长亲自给我们讲

课。返尤溪后，我调到县政府农税科任副科长，主持工作，这时我只有20岁。次年，组织上又安排我到上海华东财校（财经学院前身）学习预算管理四个月。年底农税、财粮二科合并，我被任命为县财委副主任兼财粮科长，科内有工作人员20人，财委主任由当时第二任县长关合义兼任。1953年我被调任县委当秘书、县委办公室主任，后又任县委常委。1955年底我由尤溪县委调往南平专区任供销社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就这样离开了生活、工作六年之久的尤溪城。

三元解放二、三事

张 大 林

1950年元月5日，在福州召开了赴永安专区工作的全体干部动员大会，会议由专区领导人任曰森同志作动员报告，并宣布了去各县的领导干部名单。任曰森同志首先谈了全国的形势与当前任务，会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破烂的旧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破烂的永安需要我们去解放去建设（当时永安专区尚未全部解放）。”会后，分配到各县的同志回驻地组织学习讨论，并做好出发前一切准备工作。

元月17日，去三元县工作的人员从福州坐轮船抵达南平，接着步行两天到沙县，驻在沙县师范学校，开始紧张地筹划解放和接管三元工作。

元月27日，经我方联络，国民党三元县当局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在沙县洋口仔举行的和平解放三元谈判。我方提出条件要他们放下武器由我方收编，一切公物不准破坏等待接管。对方不接受，谈判破裂。

于是当晚12时左右，我军向三元进发。参加解放三元的有人民解放军87师261团第2、3营主力，来三元县工作的全体干部也一起参加了战斗。

我们元月28日5点左右到列东，听到列西方向有枪声，我军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向列西插去由此向西包围，另一路从正东向南包围，这样形成钳形攻势。国民党三元县代理县长庄政耀、

自卫队大队长邓圣波早已知情，27日晚上第一批人向莘口、永安逃跑了。剩余士兵也不愿为他们卖命，我军只打三炮，敌兵便四下逃窜。以后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多数敌兵向我投诚，只有少数上山当土匪。解放三元战斗，仅用1个多小时就宣告结束了。

随后组建了三元县、区、乡三级政权。干部来自三个方面，军队转业干部9人，南下干部21人，三元游击队10多人，共计40余人。县委员会由5人组成，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室，两部各有部长1人、干事2人，县委秘书室3人。县行政区划设梅列、莘口、居阳三个区，下辖五个乡、一个镇。各区设区长1人、教导员1人、农会主任1人。各乡、镇设乡镇长1人、指导员1人、农会主任1人、民兵大队长1人。

三元解放后，县委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积极建立农会、民兵、妇女等组织。由于任务重，干部少，县委决定招收本地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成立青训班。招收三元、沙县、大田三县的学员40余人，经过一个多月学习训练后分配工作，有的留县部门工作，有的到区工作，这批知识青年在各级工作中起了很好作用。尽管如此，全县干部仍不满百人。当时形势严峻任务繁重，工作条件差难度大，生活困难，交通不便，但干部们工作热情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无论干什么从不计较，组织决定调动工作，二话不说拿起行李就走，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当时党政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新生政权虽然机构还不健全，人员少，但由于我们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难，使各项工作任务都能顺利完成。

当时曾流传吉乐山副县长下乡拉犁耕田的佳话。1950年春耕季节，副县长吉乐山带领几位同志下乡检查工作。有一天到莘口

区沙阳村田头检查生产，看到一家老小三口用人拉犁翻土，便立即脱下鞋子挽起裤管，下田帮助老人家拉犁。由于用力过猛，拉断绳子，人摔倒在泥水里，老人心里过意不去，让他洗干净休息一下，但他只用水洗去脸上的泥浆又继续干起来。老人看了十分感动地说：“以前国民党县长下乡坐轿子，如今共产党县长为老百姓当黄牛，还是共产党好呀！”

解放前夕动荡的永安

邓家焕

1949年5月，闽北的建阳、崇安、建瓯、南平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永安县政府和第六行政督察专署与福建省政府中断了交通方面的联系。当时永安县长陈汀和专员高凯恐慌不已，永安处于混乱状态。

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溃经永安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约30余人首先逃入永安城，继之是溃军的汽车和步兵混杂行进，后面是步兵和马队，在永安过境前后约7天。这时永安变为溃军宿营的兵站，数以万计的溃军前后混杂，乱成一片。溃军每到一处便打家劫舍、奸淫妇女、抓挑夫，被抓的人有许多至今下落不明。永安中学一位年逾四十的张老师也被抓为挑夫，以后用金戒子买通溃兵才被放走逃回。溃兵对富裕之户，搜尽金银财宝细软衣物，吃不完的作践，带不走的砸坏，甚至往锅、缸、罐里装大便。不少乡镇地方粮库大批粮食遭强行“借”走。公路桥梁亦遭烧毁，永安西门林森桥也未幸免，幸有群众救护才免于全毁。永安城关五云商店是当时永安城最大的商店，溃军初到永安城时，强行用贬值金圆券索购货物，该店忍痛出售后立即关门，后又屡遭抢劫。经永安商会出面告发，溃军头目才以军法处决一名士兵，事后宣称已无法维持军纪，溃军与流氓相互勾结，连店内仓库货物也被洗劫一空。满城百姓纷纷逃离城关下乡避难，永安城几为空城。这场兵

灾使永安人民遭受浩劫，造成损失无法统计。直至5月21日刘汝明残部才全部退出永安县境。

曹晖部队协助攻打永安城

1949年5月初，永安城中共党员仅聂诗治一人。聂因1948年12月参加捣毁国民党永安县警察局案，曾被永安地方法院传审。为争取永安早日解放，他积极联络一批有志青年，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5月下旬，聂诗治遇到从福州返回永安开展工作的永中同学陈大镛（中共党员），商议组织武装攻打永安城的计划，他们又到西洋会见了老同学詹国鼎。陈与詹的父亲是永安西南二路的地方实力派，各都掌握有100多人枪。聂诗治在永安城关也组织有10多人，如赖维棠、卢怀招、陈瑞武、罗钦崇等，并多方设法也弄到二、三枝枪。三股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

1949年6月，罗钦崇提议可请在明溪胡坊的罗行成的武装（系闽西傅柏翠部属，罗在曹晖所在团任团副职）协助攻打永安城，并称他与罗行成有过从，可由罗动员曹部来协助攻打永安。罗钦崇得到聂诗治、陈大镛同意后，往明溪胡坊与罗行成计议，并征得曹晖同意，于6月26日出发向永安进军。

6月27日黎明开始攻城时，驻守永安城的自卫队分队长陈元进率部正欲开火抵抗，负责策反的赖维棠赶来告知陈，说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请曹部来协助攻打永安的，并要陈即率部退出永安城。陈元进听从劝告，将队伍撤到上桂乡，因此双方仅交火数枪，曹晖部队和聂、陈组织的武装得以顺利进城。

攻下永安城，聂诗治、陈大镛、曹部的政委等人立即商议，成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但在重大问题上聂、陈与曹意见有分歧，聂、陈坚持立即与在南平的人民解放军林志群部联系请求指示，而曹坚持只与傅柏翠方面联系，并坚持应将收缴的枪支尽数归曹